

传承与超越 ——《玉娇梨》两个法译本的对比研究

南京大学 吴天楚

摘要: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外译史上,《玉娇梨》可谓是一座高峰。自1826年法文全译本问世以来,该书又被相继翻译成英、德等多国语言,一时风行欧洲,对于欧洲认识中国文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玉娇梨》两个法译本的对比研究,指出译本间的异同,探究造成译本差异的原因,以求对今后的汉籍外译研究有所借鉴。

关键词:《玉娇梨》; 法译本; 法国汉学; 翻译

作者简介: 吴天楚,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电子邮箱: wutianchu@gmail.com

1 引言

《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是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开山之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该书最早的法译大抵出现在18世纪,不过只有前三回,译者为“中国第一个定居巴黎的留学生”黄嘉略(岳峰、林本椿,2004)。完整的法译本则出现在一个世纪之后,由法国汉学家雷暮沙(J.-P. Abel-Rémusat)于1826年译成,书名为《玉娇梨或两个表姊妹》(*IU-KIAO-LI ou Les Deux Cousines*)。次年,法译本便被转译成英文和德文。时隔三十八年后,雷暮沙的学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于1864年出版了自己重译的《玉娇梨》(*Yu Kiao Li: Les Deux Cousines, roman chinois*)。《玉娇梨》问世后,一时风行欧洲。鲁迅就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该书“有法文译……故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鲁迅,2012: 147)儒莲也在译者前言中说,“这部作品在欧洲广为流传,流传速度十分惊人。在我们的同辈人中,但凡在1826年读过这部书的人都还

记得《两个表姊妹》的故事。”(Julien, 1864: I-II)可见,该书对欧洲文化界影响颇深,是中法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高峰。本文旨在对《玉娇梨》的两个法译本进行对比,指出译本间的差异,并探究造成译本差异的原因,以求对今后的汉籍外译研究有所借鉴。

2 译本对比——以熟语翻译为例

正如引言中提到,《玉娇梨》的首个全译本由雷暮沙译出(以下简称“雷译”),1826年出版。儒莲在1864年出版的译本(以下简称“儒译”)是对原著的复译。我们发现,师徒二人的译本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可以说,正是这些差异使得儒译本《玉娇梨》成为一部超越前译的佳作。以下仅选取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方面,即熟语翻译,对两个译本进行重点比较。

与其他古典小说一样,《玉娇梨》中运用的各种俗语、成语、典故数不胜数。这些语汇往往用字精炼、意蕴深远,且包含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意象。然而,这也给译者造成了极大困难。由于文化间的巨大差异,要理解这些熟语所运用的意象、所表达的内涵已属不易,加之两种语言系统的天差地别,要想在译入语中找到恰当的翻译可谓难上加难。所以,如何处理这些负载着大量文化信息的熟语,集中体现着译者的翻译策略,更暗含了译者对于翻译活动的认识。总体而言,《玉娇梨》的两位译者均采取了直译为主、兼用意译的方式,即努力按照汉语的字面意思进行转译,还原原文意象,但为了传达熟语的内涵,也会进行适当改动,以作解释。不过,两位译者的处理虽有共同之处,却也往往体现出差异。经过分析比对,我们将熟语翻译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

2.1 中法文意象可互通

在熟语翻译的过程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原文包含的意象不存在于译入语中。不过,表达同一内涵的意象同时存在于两种语言中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无独有偶,《玉娇梨》的两个译本中也都存在这一现象。例如第一回中,杨御史有句话说“汪都督晓得风声”(冯伟民,1983: 4)。中文用“风声”喻指消息,而法文中恰好也有avoir vent de qqch(有……的风)的对应用法,与中文意象契合。于是,雷译作Le vice-roi Wang a eu vent de tout cela...儒译作Le commandant en chef,

Wang, ayant eu vent de ce projet., 二人的译法既保存了中文意象, 又不会影响法文读者理解。又如第十回中, 苏友德对苏友白说:“或者对小弟说了, 小弟还效得一臂, 也未可知。”(同上, 1983: 112) 这里苏友德说“效得一臂”, 是用臂膀喻指帮助。而法文中也有相同的意象, 雷暮沙将其译作“prêter l'épaule”, 而儒莲译作“donner un coup d'épaule”, 两种都是法文固有的用法, 可谓是中法文完美的直译转换。不过, 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少数, 多数情况下, 中法文化中的意象都是无法互通的, 需要采取相应策略来传情达意。

2.2 法文无相应表达, 但直译不影响理解

正如前文提到, 在大多数情况下, 一种语言的熟语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应表达。不过即便如此, 有时采取直译的方法也并不会影响读者理解。例如在第一回中, 杨御史对吴翰林说, “昨赖老先生大才润色, 可谓点铁成金……”(同上, 1983: 5)。此处, 杨御史用“点铁成金”比喻文章经吴翰林修改后变得十分出色, 两位译者均将其译作 *On peut dire que vous avez changé le fer en or*, 意即“把铁变成了金子”, 保留了中文的意象, 而由于西方文化中存在炼金术一说, 所以法文读者联系上下文便能很容易地读懂原文意象的所指。又如第二回中, 白公道:“若说眼前这些富贵, 不瞒先生说, 真不异浮云敝屣。”(同上, 1983: 13) 此处, 作者用“浮云敝屣”一词表现白玄对富贵的不屑, 雷译作 *Je le considère comme de légers nuages ou comme la chaussure que je foule aux pieds.*, 儒译作 *J'en fais aussi peu de cas que d'un nuage qui flotte dans l'air ou d'une chaussure usée.*。两位译者都将“浮云”和“敝屣”的意象在法文中如实地再现了出来, 因为根据上下文, 中文中的意象能够被读者理解。不过雷暮沙为了确保法文读者能够正确理解文意, 对原文意象略有改动, 将“浮云”译成了 *de légers nuages* (很轻的云), 将“敝屣”译成了法文中固有的 *la chaussure que je foule aux pieds* (踩在脚下的鞋), 意即“不屑”; 而儒译则完全还原了两个意象, 未作改动。又如第六回中, 苏友白听闻白家小姐美貌, 又得见其诗才, 因而夜中难寐, 心想:“便蹈汤赴火, 死在这里, 也要寻他一见。”(同上, 1983: 71) “蹈汤赴火”, 雷译作 *traverser les flots ou la flamme*, 儒译作 *marcher dans l'eau bouillante ou traverser des flammes*。二者基本都还原了原文意象, 且能够让读者理解原文意思。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将“汤”(沸水) 译作 *flot* (波涛), 用西方读者熟悉的波涛意象引起读者对艰难险阻的联想, 不过这样一来, 译文与原文就略有出入; 而后者则按照原文, 将“汤”译成了

l'eau bouillante (沸水)。

2.3 法文无相应表达,且直译影响理解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发现,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两位译者都尽可能地采取直译的策略,以传达原文的意象。不过,由于中法文化的巨大差异,中文熟语中的意象往往会对法文读者造成理解障碍。例如第一回中,作者将白公赏玩的十二盆菊花比作美貌的女子,又因中文里常用金钗代指女子,固曰“列金钗十二”(同上,1983: 2)。倘若不作解释,西方读者很难理解此中深意。这一句雷译作 *douze têtes dorées*,“金钗”被译成了“金色的头”,并未加注,原文的意象无从得见,且容易造成阅读障碍;而儒译则用意译的方法,译作 *douze jolies femmes* (十二个美丽的女子),并加了一个多达十几行的脚注,解释原文“金钗”的喻意及出处。我们对比两个版本的翻译后发现,类似情况时有发生。例如第三回中,苏御史替杨御史向白太常提亲,说杨御史“因前日见令爱佳章,知贤淑多才,甚生欣慕,意欲丝萝附乔,故以柯斧托弟”(同上,1983: 26)。此处有两个典故:一为“丝萝附乔”,同“丝萝乔木”,喻指男女间的亲事;一为“柯斧”,语出《诗·邶风·伐柯》,喻指媒妁。雷译依旧采用直译的方式,将“意欲丝萝附乔”译为 (*désirer*) *de voir le lierre s'entrelacer autour de l'arbre* (希望看到丝萝盘绕在树上),而将“以柯斧托弟”译为 (*remettre*) *entre mes mains le manche de la cognée* (将斧柄交到我手中),且两处意象依旧没有加注说明,不懂中国文化典故的西方读者势必难以理解。相比之下,儒译将第一处译为 *voir le faible liseron s'appuyer sur le grand pin* (希望看到柔弱的牵牛花攀附在高大的松树上),而第二处译成了 *il m'a chargé d'en faire la demande* (他托我来求亲)。我们发现,第一处的“丝萝”和“乔木”两种植物被译者稍作改动,变成了西方读者熟悉的两种植物,即牵牛花和松树,让读者易于理解该意象背后的内涵。与此同时,为了忠实于原文字面的确切意思,作者在脚注中注明了原文用词的拼音,然后逐字解释了汉字的本意,并且从植物学的角度,对“丝萝”和“乔木”的种属给出了科学的解释;至于第二处,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将“柯斧之托”的内涵意直接译出,且同样加脚注,解释了“柯斧”的字面意思以及出处、内涵,甚至将《诗经》中的相关诗句也翻译出来附在了脚注中,可谓尽善尽美。从这两个意象的处理中,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尽管两位译者都采用直译为主的策略,但儒译较之雷译走得更远。再举一例说明:第三回中,白公询问张吏部,是何人举荐他出使匈奴,议迎英宗。他问:“不知是何人推毂以误朝廷?”(同上,1983: 34)“推毂”

即推车前进,比喻推荐人才,两位译者均意译为recommander(推荐),而隐去了会造成理解障碍的字面含义。所不同的是,此处雷译依旧不加注,而儒译再次加注,解释了“推毂”的字面意象。可见,儒译较之雷译更倾向于使用这种加注的方式来弥补译文的缺失,译文中的其他例证也都印证了这一点。

2.4 误译与修正

在以上三种情况中,我们所举的都是得到较好解决例子。然而在分析译文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另一类情况,即雷译中许多在语义层面上理解失当的误译,在儒译中得到了修正。例如,在第六回中,白公遭陷害,不得不出使塞北,于是便将女儿托付给吴翰林,却感怀女儿尚未婚配,道:“今日虽有吾兄可托,而玉镜未归……”(同上,1983:32)。此处借“玉镜”代指嫁妆,实言女儿的婚事。雷译沙将“玉镜未归”直译作 *mais le miroir de jaspé n'a pas encore été mis en usage*,而且没有加注,这势必无法让读者了解其中的内涵。显然,这是一个望文生义的典型例子,作者并不了解玉镜的深意,因而也就无法对其作出解释,这样的情况在雷译中并不鲜见。而相比之下,儒译则意译作“*elle n'est pas encore fiancée*”,且加脚注,解释原文“玉镜”的字面含义及其内涵、出处,在保证读者正确理解文意的前提下,弥补了意译造成了意象丢失。又如第十二回中,白公令苏友德与张轨如作诗,借用李白的典故说“一酒百篇,青莲佳话”(同上,1983:96)。此处的青莲是指李白的别号“青莲居士”。雷译作 *Une urne de vin inspire cent pièces de poésie, et la coupe du nénuphar bleu est la source des beaux vers.*“青莲”变成了 *la coupe du nénuphar bleu*(青莲酒杯),这也是译者望文生义的结果。因为译者想当然地将“青莲”理解成了对酒杯的比喻,从而造成了误译。儒译则纠正了这一错误,译作 *Après avoir bu une cruche de vin, dit Pé-kong, un poète composa jadis cent pièces de vers; c'est ce qu'on a dit jadis à la louange de Li-Tsing-lien.*“青莲”二字被译者还原成了人名的形式,即音译作“李青莲”,便于读者理解。此外,儒译还加脚注解释了“青莲”是李白的别号,一如既往地弥补了意译造成的意象缺失,令读者能够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3 基于译本对比的分析:传承与超越

两个不同的年代,两位不同的译者,造就了两个不同的《玉娇梨》译本。通过上文对雷、儒两个译本的对比,我们发现,译本之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时

时体现出差异。可以说,复译本《玉娇梨》在传承初译本优点的同时,又超越了初译。

首先,作为雷暮沙的学生,儒莲在重译《玉娇梨》的过程中传承了老师的优点。就译本而言,这一传承主要体现在翻译策略上,师徒二人均在译作中贯彻了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策略。纵观前文对熟语翻译的考察,在2.1和2.2的情况下,两位译者均努力在译入语中再现原文的意象和语意,诸如“风声”“一臂之力”“赴汤蹈火”等汉语熟语都在法译中得到了较好地处理,使得法语读者能够藉由译文窥见中国文化的风貌,而这一策略也是两个译本中的常态。当然,二人也并非不分情况地一味直译,比如在2.3中,碰到直译影响理解的情形,二人均灵活地采取了意译的方式,并采取加注的方式来弥补意译的缺失。不过尽管意译在所难免,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在两个译本中还是贯穿始终、一脉相承的。而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也折射出了儒莲在翻译过程中继承老师雷暮沙的忠实翻译观。正是在这一翻译观的指导下,儒莲才采取了与老师相似的翻译策略。

其次,作为对原著的复译,儒译《玉娇梨》显然是对初译的一个超越。这一超越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对于直译加注为主的翻译策略,二人的贯彻程度有所差别;二是复译纠正了初译本中的大量错误。

其一,尽管雷译也坚持直译的策略,但儒译显然贯彻地更加彻底。我们发现,雷译对中文熟语的翻译相对比较自由。比如“浮云蔽履”“赴汤蹈火”,雷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改动。而相比之下,无论是熟语翻译中的哪种情况,儒译都基本还原了原文意象,即便是因无奈而采取的意译(如对“推毂”“金钗”“柯斧”的意译),儒莲也一一加注,弥补原文意象的丢失。而正是因为儒莲对直译策略的彻底贯彻,才致使其译本中融入了大量外来意象,从而必须借助更多的注释来做解释或补充。经统计,雷译本正文共有脚注174个,而儒译正文的脚注则多达1328个,其数量是前者的七八倍。也就是说,较之雷暮沙相对保守的加注,儒莲更倾向于通过注释来还原一切丢失的意义和意象。这样一来,儒译就显得更为精准、更加完善了。

其二,复译本对初译本中误译的纠正也是有目共睹的。在2.4中,我们已指出雷暮沙对“玉镜”和“青莲”两个意象望文生义的译法。事实上,初译本中类似的误译甚多。而在复译本中,大部分误译都得到了修正,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至少做到了语义层面的忠实,且都标明了典故出处。这一译作质量的显著提升自然使得儒译超越雷译,达到了新的翻译水准。

综上所述,复译本一方面继承了初译本以直译加注为主的翻译方法,与初

译本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理念一脉相通。另一方面,复译本对初译本的误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并用加注的方法尽力向读者展现原文的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对前作的一个超越。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复译本与初译本一脉相承,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复译本的超越呢?以下我们将对影响两个译本的因素作一番探究。

4 译本差异原因探究

关于影响翻译的因素,诸多翻译理论家都有所论述。《翻译论》中,许钧在总结各学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影响翻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等都会对翻译结果造成影响(许钧,2006:195)。通过对《玉娇梨》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使得两个译本或承袭、或相异的因素突出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在外,是法国汉学的发展状况;在内,则是两位译者的翻译动机。以下即从这两方面展开论述。

4.1 法国汉学的发展状况

作为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必然处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具体到《玉娇梨》的法译,则集中体现为法国汉学的发展状况对两个译本的影响。

作为法国现代汉学的奠基人,雷暮沙的处境十分艰难:一方面,法国现代汉学方才起步,对于汉语和汉文化知识的传统霸权仍掌握在耶稣会士手中,而大量汉籍和词典也都藏于皇家图书馆,普通人几乎无从获取;另一方面,“19世纪40年代之前,由于种种原因,中法两国往来几乎中断”(许光华,2009:91),中西交流受阻,在法国无缘得见中国人,雷暮沙也更是无法亲自到中国学习。资料的稀缺和经历的匮乏都大大影响了雷暮沙时代对于汉语和汉文化的学习。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学汉语所遭遇的困境:

我甚至连一本字典也没有;帝国图书馆里珍藏着海量的各类资料,却至多只有十六到十八本中—欧词典,还要除去其中重复的或是不完整的几本。……我所做的所有翻译,以及为这部书稿或为我准备的论文所做的研究,都是借助我自己编的词典来完成的……(Abel-Rémusat, 1811: VIII—IX)

从以上一段自述中我们便可看到，在雷暮沙时代，汉学资源相当匮乏，甚至要靠各种办法，自己编纂词典，以作学习之用。虽然法兰西公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 于1814年起设立了汉语讲席 (Chaire de sinologie)，并由雷暮沙出任首位讲席教授，但在19世纪初，汉语教学仍然受到法国东方学界的轻视。19世纪的法国东方学家欧内斯特·勒南 (Ernest Renan) 就曾不屑地说：“中文以及中文无组织、不完备的结构，难道不是象征了中国人精神和心灵的荒芜吗？” (Bergère & Pino, 1995 : 32) 这一观点也代表了当时法国学界的普遍认识。正因为如此，于18世纪就已建院的法国东方语言学院 (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曾开设中文课程。

到了儒莲所处的时代，汉学的发展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一方面，除了法兰西学院的汉语讲席之外，政府终于批准从1844年起在东方语言学院开设汉语课程，由受教于雷暮沙和儒莲的学生安托万·巴赞 (Antoine Bazin) 任教。汉学的发展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汉语在法国的教学和汉学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汉学资源较之雷暮沙时代已随时间推移而日益丰富。在复译本《玉娇梨》的前言中儒莲提到，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要比自己的老师多得多：

比起他，我多了一系列丰富的中文书籍，没有这些书，我不可能翻译出《平山冷燕》和《玉娇梨》，尤其不可能给这两部书作注。除此之外，我还有（因为我丝毫不想自诩功高）两个满语版本的《玉娇梨》，一个版本缺少最后两回，另一个版本则完整无缺。(Julien, 1864: XXII)

卷帙浩繁的辞书《佩文韵府》(106卷)和《平仄类编》(240卷)，以及前文提到的满语版本，都是阿贝尔—雷暮沙完全没有的，而由于缺少了这一宝贵的辅助，他译作中的重大且繁多的错误也是可以谅解的……(同上，1864: XXV)

可见，儒莲不仅有更多的词典工具书来辅助翻译，而且还有满语版的《玉娇梨》作为参照，大大便利了翻译工作的进行，对于其修正初译的错误也必然有很大帮助。可以说，以上诸多资源的丰富与法国汉学的积累和发展都是分不开的。

从以上两位译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法国汉学的发展，随着前一代

汉学家的孜孜耕耘,汉学资源日益丰富,这对于《玉娇梨》的翻译无疑是极大的帮助。复译本中对误译的修正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汉学资源的丰富,因而使得《玉娇梨》的复译本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得以超越初译。

4.2 译者的翻译动机

翻译动机,即翻译的目的。德国功能学派主张目的论,认为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翻译行为的目的。许钧也指出:“译者的翻译动机,是体现翻译主体因素的重要部分。”(许钧,2006:224)。对比了《玉娇梨》的两个译本后我们发现,两位译者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直译加注为主的策略,极力还原原文中的字面意象。这恰恰与他们的翻译目的密不可分。

19世纪的欧洲,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占主导地位,认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镜子。作为开创法国现代汉学的先驱,雷暮沙的汉学研究也秉承这一理念。所以,他翻译《玉娇梨》是为了借中国的小说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情,引入新的风俗,用以教化民众。他在译者前言中提到:“过去,小说只被看作是娱乐读物,专供无所事事之人消遣:我们则要将其变为有用之书,用来教化那些无暇阅读历史的人们。”(Abel-Rémusat,1826:1)

而基于这一目的,他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我认为,必须谨防对翻译作品进行美化的做法:人们所需要的,不是写出优美的法语作品,而是如实地展现东方民族的作品,无论其好坏。倘若想加以改进,那只会使其面目全非,倘若想使其欧化,那这些作品就不再是亚洲的了。”(同上,1826:58)

从上面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雷暮沙反对对译作进行美化,认为翻译就是要如实地传达原作的原貌,否则,引入中国风俗来教化本国民众的目的也就无从达到了。正是这一忠实的翻译观指导了他对《玉娇梨》的翻译。至于儒莲,则更是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目的:

翻译《平山冷燕》,我有双重目的,即:首次在欧洲介绍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忠实、生动且尖锐地描绘了一幅画卷,展现出了中国文学的偏爱和传统;而对于想读原文的学生来说,仅靠目前出版的字典和文献,他们无法完全读懂这样的作品,而这部译作能够向他们展现最高雅、最卓越也是最难理解的白话文作品。(Julien,1860:I)

尽管这段话出自《平山冷燕》的译者前言,但显然,译者翻译《玉娇梨》的目

的也如出一辙。从以上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和雷暮沙一样,翻译中国小说首先是出于文化层面的考虑。正因为如此,他才和雷暮沙一样,坚持忠实的翻译观,又坚持以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以求如实地传达汉语文学的原貌。不过除此之外,儒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即以其译本为范本,帮助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白话文。我们知道,儒莲在雷暮沙去世后继任了其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席,随后,又长期在东方语言学院任教。所以对他来说,中文教学与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翻译的小说恰恰是很好的学习材料。这样一来,儒莲的翻译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自己的小说译文字字精准,便于教学。所以,他不惜舍弃读者的阅读感受而极力直译,并加以大量注释的做法就很好理解了。他自己也在复译本《玉娇梨》的前言中袒露了自己坚持忠实的翻译观:“我设法使我的译文尽可能忠实,这样做尤其是出于对学生的考虑,为了使他们像我一样,理解原文的所有措辞。”(同上,1864: XXXII)

可见,正是两位译者的翻译动机,使得他们形成了既相似、又有所差别的翻译观,进而对《玉娇梨》的两个译本造成了影响。然而尽管两人都秉承了忠实的翻译观,采取了直译的策略,但较之雷暮沙的译本,儒莲的译本在直译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大部分文化点都有解释可寻,可谓是学习中文的范本。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玉娇梨》的两个译本之所以体现出“传承——超越”的关系,其原因是双重的。既有外界因素,即法国汉学发展状况的影响,也有内在因素,即译者自身翻译动机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两位译者所处时代法国汉学的不同发展程度,使得两位译者在翻译水准上形成了对比,从而给复译超越初译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两位译者所持有的翻译动机既相似又有所不同,因而使得复译在承袭前译的基础上,得以超越前译。

5 结语

《玉娇梨》的法译是中西交流史上的大事。通过雷暮沙的法文初译本,欧洲多国得以转译该小说,令整个欧洲对中国的风俗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部译作更与其他翻译作品一道,启发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可谓意义重大。而儒莲的复译本更是以其多年的积累和打磨,对初译进行完善和提高,为后来者学习汉语、了解汉文化的背景知识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范本,对于欧洲汉学界的贡献不可小视。

通过对《玉娇梨》两个法译本的对比,我们发现,复译本与初译本既一脉相

承,又对初译本有所超越和提高。当然,我们说复译超越初译,并不意味着复译就已经无懈可击,儒译本中当然也有误译之处,这在所难免。儒莲本人也中肯地说:“然而,要说译文里没有错误,那我差得还远。”(Julien, 1864: XXXII)此外,尽管复译本自言专为汉语学习者服务,但其中一千多处脚注也必然使译本显得冗赘,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困难。这是儒译本《玉娇梨》无法回避的缺陷,也是一大遗憾。不过尽管如此,在今天看来,两位译者的忠实翻译观,以及他们严谨务实的态度,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至于两个译本中的不足之处,以及如何完善这些不足,则有待后来者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 Abel-Rémusat, J.-P. 1811. *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aris : Treuttel et Wurtz.
- 1826. *Iu-Kiao-Li, ou les Deux Cousines, roman chinois, précédé d'une préface où se trouve un parallèle des romans de la Chine et de ceux de l'Europe*. Paris : Moutardier.
- Bergère, M.-C & A. Pino. 1995.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Paris : L'Asiathèque.
- Julien, S. 1860. *P'ing-Chan-Ling-Yen. 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ées*. Paris : Didier.
- 1864. *Les Deux Cousines, roman chinois*. Paris : Didier.
- 鲁迅,2012,《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
- 许光华,2009,《法国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
- 许钧,2006,《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清)荻荻散人编次,冯伟民校点,1983,《玉娇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岳峰、林本椿,2004,黄加略——曾获法国皇家文库中文翻译家称号的近代中国译坛先驱,《中国翻译》(1): 45—47。